

刘进宝 著

敦煌学术史

——事件、人物与著述

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
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刘进宝
著

敦煌学术史

——事件、人物与著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学术史:事件、人物与著述/刘进宝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2

ISBN 978 - 7 - 101 - 07706 - 3

I. 敦… II. 刘… III. 敦煌学 - 历史 IV. 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4395 号

-
- 书 名 敦煌学术史:事件、人物与著述
著 者 刘进宝
责任编辑 罗丹妮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 zhbc. com. cn](http://www.zhbc.com.cn)
E - mail: zhbc@ zhbc. com. 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frac{3}{8}$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706 - 3
定 价 26.00 元
-

目 录

敦煌学术史研究有待加强	(1)
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	(7)
应重视对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研究	(16)
三十年来(1978—2008)敦煌文献整理的重大进展	(21)
略述 20 世纪 80 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卓越成就	(32)
从“唱衣”研究看学术研究的困难	(47)
贺昌群先生与敦煌学	(58)
郑振铎 1957 年甘肃行纪暨敦煌考察报告	(61)
郑振铎与俄藏敦煌文献	(72)
王永兴先生学术研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86)
柴剑虹先生与敦煌学研究	(95)
傅斯年为伯希和的辩解	(114)
“敦煌人”和敦煌石窟	(118)
《俄藏敦煌文献》出版的艰难历程	
——重读潘重规先生的《列宁格勒十日记》	(128)
童丕《敦煌的借贷》评介	(141)
为编写敦煌学史添砖加瓦	
——评柴剑虹先生的《敦煌学与敦煌文化》	(152)

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评介	(163)
-------------------------------	-------

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	(173)
-------------------------------	-------

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评介	(179)
-------------------------	-------

《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评介	(193)
------------------------	-------

佛教初传时期的北方社会

——读尚永琪《3—6 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	(207)
---	-------

敦煌西域文献整理的可喜成果

——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	(222)
--------------------------------------	-------

均田制研究从何处突破?

——浅谈《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	(225)
-----------------------	-------

附录:

国际敦煌学研究的一次大检阅

——1988 年北京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综述	(227)
--------------------------------	-------

“海峡两岸敦煌文学研讨会”纪要	(237)
-----------------------	-------

新时期敦煌学的第一次盛会

——二十一世纪敦煌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40)
-------------------------	-------

《百年敦煌学》后记	(251)
-----------------	-------

后 记	(260)
-----------	-------

敦煌学术史研究有待加强

作为一代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其兴起的时间仅百年。敦煌学的研究又有其特殊性:(1)藏经洞文献发现于1900年,当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中央政府自顾不暇之时;发现的地点在当时已属十分偏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敦煌;发现者是没有文化又愚昧狡黠的道士王圆篆。(2)文献流散的神秘性和广泛性。敦煌文献发现后,流散到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因为向国外和国内私人的流散都是不合法的,因此其流散是隐蔽的,大部分都没有公开的记载。(3)流散与研究的分合。有些是单纯的流散,有些在流散中有记载、有研究,因此,流散与研究既不是统一的,又无法将其截然分开。(4)收藏和研究的国际性。敦煌文献流散收藏在十多个国家的几十个图书馆和博物馆中,有些还在私人手中。各收藏国在整理所藏敦煌文献时,同时也就展开了研究。(5)研究的困难。敦煌文献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历史、地理、宗教、艺术、语言、文学等等,被称为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总数达5万多件的文献,其中绝大部分是写本。这些写本文献虽然主要是用汉文书写的,但也有不少用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等文字抄写的。敦煌莫高窟作为以佛教为主的寺院,文书的内容自然也以佛教文献为多,此外还有道教、摩尼教等宗教典籍和有关祆教的记录;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文学作品如诗、词、曲、赋以及变文等;图经、方志、医药、历书、社会经济资料等也是应有尽有。这样包罗万象的资料,又有多民族的

语言,甚至还有一些死文字(今天已不再使用的文字),其研究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不是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在较短的时间能够解决的。

正是由于敦煌学本身的这些特殊性,不要说敦煌学的各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关乎敦煌学学科形成的学术史,也还有许多问题至今并没有搞清楚,有些问题也还没有定论。正如荣新江教授所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①

因此,不要说我们目前还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学术史,就是敦煌学学术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都还有待于探讨。如:

一、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究竟始于何时?至今仍纷争不已。

目前就有1900年、1904年、1907年和1909年等几种说法。按照现有资料,我倾向于将1909年作为敦煌学的起始。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任何一门学问都要有一定的资料。敦煌文书虽然早就发现,但在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展示之前,只有个别学人见到过个别文书;第二,要有一定的研究规模。1909年前,虽然叶昌炽等人曾对敦煌文书有所关注,但引起学界的重视及有规模的研究还是从1909年开始的;第三,对继续研究的引导。1909年伯希和与罗振玉等中国学者相遇后,罗振玉即根据从伯希和处抄录的资料进行刊布,最早的就是发表在1909年11月7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六卷第十期上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紧接着在同年第六卷第十一、十二期上又发表了《莫高窟石室秘录》,这就是第一批公开的敦煌文献,另外还有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罗振玉

① 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和蒋斧的《敦煌石室遗书》等第一批敦煌学研究著作的问世。

伯希和在北京时,接待的不单纯是中国学者;当时在北京由日本人开办的文求堂书店的主人田中庆太郎也曾访问过伯希和,他在1909年11月1日出版的《燕尘》杂志上,以《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为题介绍拜访伯希和的见闻,还全面介绍了罗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与此同时,罗振玉也将敦煌发现古代文书的信息,写信告诉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1909年11月12日,东京、大阪两地出版的《东京朝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上,刊出了根据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写成的《敦煌石室的发现物》,报道了敦煌的发现。由于东京、大阪两地出版的《朝日新闻》读者面广,所以此文在日本敦煌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随后内藤湖南又以《敦煌发掘的古书》为题,在1909年11月24—27日的《朝日新闻》(大阪)上作了连续报道,^①同年出版的《绘画丛誌》也予以转载。从而引发了日本的敦煌热潮。所以不少学者认为,正是1909年开始的敦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敦煌学。

二、我们对敦煌文献流散的详情与细节还不十分清楚。

如外国探险家获取敦煌文物的过程还不清晰,有些甚至连基本情况都不知道。目前了解最多的还是斯坦因,国内已翻译出版了他的《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沙埋和阗废墟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中译本为《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但这仅仅是斯坦因公开发表的考古报告和游记,有些秘密他没有、也不会公开发表。

从现有资料看,斯坦因除了学者、考古学家的一面或身份外,还有其不愿公开的一面或身份。如他第一次来中国时,护照上的

^① 参阅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1—72页。

身份是考古学家,第二次来的时候,变成了“英国总理教育大臣”,第三次又变成了“印度总理教育大臣”。他这样不断地变换身份,显然是有目的的,即便于他的活动。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①、《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②可知,对地处战略要地的新疆和西藏,“英人久有覬覦窥伺之心”,斯坦因的探险是“奉印度政府之使命”,“实受英国在印度之居留政府所派遣,从行有熟悉军事者,更有一充分之测量队,沿印度入新甘之道路,细密测量,直达兰州。此时正是印度政府向西藏进兵,行其所谓积极政策之时,斯氏此行之有军事的作用,固不待言”。其“目的系借考古迹为名,偷绘我国地图”,“以调查自印度入新疆、甘肃、陕西之军路者,故其沿路测绘,用兵险要之地尤加注意,彼时英俄两国各向新疆探测军路,而以司代诺(即斯坦因)之经历为最多”。他“名为考古,实则暗中盗窃吾新古物转运英国”。

斯坦因第四次来我国前夕,因为已有1927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及其协议,所以有人“主张此种大举考古非与中国人合作不可,并说明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全与满清时代不同”。而斯坦因则说:“我只知有旧中国,我不管什么是国民党的少年中国之喊叫。国民党最无聊,外国人应不理睬,以前外国人与中国学术团体接洽合作皆是无聊,而且上当。新疆并不能算是中国领土,中国并无中央政府,新疆又不开化,我的老经验依然适用,只要拿些钞票行贿新疆官吏无不行的。”^③

2007年恰好是斯坦因劫取藏经洞文献100年,因此,还有媒体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②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

③ 《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46页。

将 2007 年称为“敦煌学百年”，就是将斯坦因盗劫敦煌文献作为敦煌学的开始，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更有甚者，2007 年 4 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稚青之《百年敦煌》一书，明目张胆地为斯坦因叫屈并为其歌功颂德，强调“斯坦因中国西域考古与探险是基本合法的”；“斯坦因和王道士的交易不存在欺骗行为”。

正是由于斯坦因是第一个骗盗敦煌文物的探险家，他的学术考察著作又多，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得也相对充分。但即使如此，我们对斯坦因的许多情况也并不完全掌握，更不要说其他的考察家了。

另如俄罗斯所藏敦煌文献，其来源目前还不清楚，一方面俄方没有公布有关档案；另一方面，奥登堡在莫高窟的时间是 1914 年 8 月至 1915 年 1 月下旬。这时，斯坦因、伯希和已将大批文物劫往英、法，中国政府也将劫余运到北京，王道士私藏的一些也于 1914 年卖给了斯坦因，再加上日本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又搜寻了一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有一万多卷的敦煌文献在等待奥登堡呢？

再如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并不像其他国家的考察团，主要是由博物馆等学术团体资助的，其成员也不是学者，而是西本愿寺的僧人，再加上大谷光瑞与日本军方有密切的交往，而且还与日本皇室关系密切（其妻筹子是贞明皇后之姐），因此有人称其为“间谍探险”，就是日本方面也无法断然否认。

三、我们对本国早期敦煌学家的活动和著述还缺乏全面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目前，对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相对多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史学界对王国维、罗振玉研究较多，其论著的出版也比较多的原因，敦煌学界的研究也主要是侧重于对其论著的研究，但还不是很全面和系统，缺少对其论著写作背景的探讨。

如端方，就是应该值得重视的一位。1905 年，清政府派大臣出

洋考察宪政时，端方到达欧洲。他在柏林博物馆看到了出自吐鲁番的《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后十分惊讶，就立刻进行了拓印。归国后，著名学者纷纷前往观看，并书写感想。吐鲁番文物受到国内学者注意，此事甚为重要。^① 1909年，伯希和来中国为法国远东学院购书时，就是端方首先得知伯希和携带有敦煌文书的消息，这才有了伯希和与北京学者的见面及展示所携敦煌文献之事。另如董康，其作为诵芬室主人，刊刻了一些早期的敦煌文献，这已为学界所知。但他曾八次赴日，与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神田喜一郎、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田中庆太郎、石田干之助等都有学术往来，著有《书舶庸谭》一书，内有许多有关敦煌的记载，我们对其研究就比较薄弱。

此外，还有王仁俊、许国霖、蒋伯斧等等，都需要给予重视研究。

进入新世纪后，国际敦煌学界，对敦煌学术史的研究日渐重视，2001年，在日本京都举行了“草创期的敦煌学”研讨会，以纪念王国维、罗振玉东渡日本百年；2002年，在北京举行了“敦煌学学术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敦煌学的学术史研究，写出一本既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能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史，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① 参阅孟宪实、荣新江《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载《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

敦煌学史上的一段学术公案

《历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所载荣新江先生的《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①一文,从“可恨可喜”与“以德报怨”、《劫余录》与“伤心史”、伦敦留难与巴黎协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四个方面,就贯穿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问题做了高屋建瓴的阐述。

正如荣新江先生在《视野》一文中所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笔者非常赞同荣新江教授的论述,同时作为对荣教授大作的响应,也为了能对编写敦煌学学术史贡献一点绵薄之力,现对所谓藤枝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提供一点补充。

关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荣先生在《视野》中说:“正好就在大陆敦煌学刚刚重新起步的 1981 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应天津南开大学之邀,来南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并油印发行了《敦煌学导论》……然而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敦煌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藤枝晃在南开讲演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一说在京都)’。这话一经传开,就使得许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中国学者十分不满。笔者曾经向几位当时听课的中

^① 载《历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第 165—175 页,以下简称《视野》。

国学者询问这话的来历,他们都说这话其实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某位先生说的,意在请大家重视这位一般学子还比较陌生的敦煌学家。在今天看来,这话无疑是个误传。”

藤枝晃教授来南开大学讲演是1981年4—5月,讲演结束后,南开大学历史系于1981年6月将藤枝晃的讲演稿整理为《敦煌学导论》油印,在油印稿的前言中说:“本稿为国际著名的敦煌学专家,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藤枝晃教授今年四月八日至五月二十三日在我系为本科学生讲课的记录稿。现应本系师生和前来听课的兄弟院校同志们的要求,整理印[刷]供参考。……武汉大学朱雷同志和中山大学张荣芳同志在听课过程中也参与了本稿的部分整理工作,在此特表谢意。”^①

藤枝晃教授于1981年初能来南开讲演,除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大的形势外,与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教学》总编辑、著名日本史专家吴廷璆教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32—1936年吴廷璆教授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留学时,藤枝晃也恰好是京都大学史学科的学生,他们两人是同学。

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说:据几位当时听课的中国学者说,“这话其实是请藤枝晃来讲演的南开某位先生说的,意在请大家重视这位一般学子还比较陌生的敦煌学家”。这里的“南开某位先生”实际就是指吴廷璆教授。当时的敦煌学研究,虽然在国内已经起步,但对一般学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正是为了让大家重视这门还比较陌生的学问、重视国内一般学人还比较陌生的藤枝晃教授,吴廷璆教授在藤枝晃刚来南开或来到南开前夕,就呼吁学界重视敦煌学和藤枝晃。在《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4期上,有一篇“本刊专访”,题目就是“海人不倦的吴廷璆教授”。在这篇专访的后面有

^① 其中“印刷供参考”的“刷”原文缺,是笔者根据文意增补的。

一段话,很值得引起注意:

吴先生还讲了日本史学界近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日本有一部很有名的《三经义疏》,历来公认为是公元六、七世纪间日本圣德太子所写。有一位名叫藤枝晃的京都大学老教授在研究我国敦煌写经钞本中发现这三部佛经中的《胜鬘经》义疏原来是魏晋时代中国人所写,因此证明《三经义疏》根本不是圣德太子的著作。藤枝晃教授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震动。说到这里,吴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年轻人一定要有志气参与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不正常状态,要有志气改变史学研究的落后状况。

《外国史知识》当时是月刊,1981年第4期出版于4月14日,而藤枝晃教授是4月8日开始在南开演讲的,前后只有一周时间,中间只隔5天。在当时的排版、印刷条件下,如果吴廷璆教授是4月8日所讲,要在4月14日出版的杂志上刊载,中间还有记者的采访、杂志社要预留版面等,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更可能的应该是在藤枝晃教授来南开前夕吴廷璆教授讲了此话,讲的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而不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由于吴廷璆教授已有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之说、之想,因此,当4月8日藤枝晃在南开演讲,吴廷璆教授主持并介绍藤枝晃教授时讲了此话。为了突出日本和藤枝晃,就改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了。

由于藤枝晃1981年来中国时,他还没有去过敦煌,因此这次的中国之行,还有去敦煌参观的愿望。当时,不论是天津,还是北京、上海,都没有直达敦煌的航班。去敦煌必须要在兰州中转。这就有了藤枝晃在兰州的演讲。

藤枝晃路过兰州时,在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进行了学术演讲。这次演讲的主持人是著名隋唐史研究专家、时任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的金宝祥教授,其介绍者就是吴廷璆教授。因为吴廷璆教授和金宝祥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曾是四川大学的同事,两人有着密切的交往,1986年秋,当两位老人都70多岁时,吴廷璆教授还专程到了兰州,住在金宝祥先生家中共叙友情。正因为有此友情与联系,当藤枝晃在南开讲演结束去敦煌时,吴廷璆教授就写信希望金宝祥教授给予接待。

当时的兰州还比较封闭,外国学者很少能来兰州,再加上藤枝晃是国际著名的敦煌学专家,甘肃又是敦煌学的故乡,金宝祥教授也是当时甘肃少有的几位敦煌学研究者之一。^①这种种因素的组合,就有了藤枝晃在西北师范学院的演讲并引起的轰动。

藤枝晃在西北师范学院演讲的时间是1981年5月26日下午,演讲的题目是“现代敦煌学”,主办方对藤枝晃的介绍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敦煌学专家、中西交通史专家藤枝晃博士。”当时在兰的高校、文化出版、机关、文博单位的上千人听了演讲,整个西北师范学院礼堂全部坐满,甚至走廊中还站了人,包括笔者在内的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许多学生也听了演讲。

当时敦煌学已经开始复苏,兰州大学于1979年建立了敦煌学研究小组,同时邀请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段文杰先生和甘肃省图书

① 1982年4月15日,教育部高教一司在给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关于发展敦煌学的建议》中说:估计国内现在对敦煌学有研究的学者,老中青合计约100多人,其中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约四五十人,文中举例说到“厦门大学的韩国磐教授,山东大学的王仲荦教授,西北师院的金宝祥教授,北京师院的宁可教授,天水师专的张鸿勋副教授等,都对敦煌学有所研究”。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刊》,第186页。

馆的周丕显先生为历史系进修班开设了“敦煌学”课程,并于1980年2月出版了《兰州大学学报》的“敦煌学”专刊(即《敦煌学辑刊》的试刊第一期)。另外,敦煌文物研究所正在编辑《敦煌研究文集》、筹办《敦煌研究》;西北师范学院、西北民族学院、甘肃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也有学者关注敦煌学。

正是1981年5月26日在西北师范学院的演讲中,藤枝晃说到: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同时还讲到“高昌的文化有独特的特色”等。

在1981年那个极具爱国主义的时代,藤枝晃的演讲,尤其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和“高昌文化的独特性”之说,即引起了大家的争论,许多听讲者还纷纷向中央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写信反映。当晚我们宿舍中的同学也曾激烈争论,有的同学甚至说,藤枝晃是帝国主义者,怎能说高昌文化具有独特性?这不是想将高昌从中国割裂出去吗?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样一句学术评判为何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呢?这既与当时极具爱国主义的时代,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女排的“五连冠”引起国人的振奋等有关,也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尽管“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是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但从国人的心态来说:此话我们可以说,但外人不能说。我们自己说,是我们的谦虚,我们有自知之明;外人说了就是对我们的小瞧,乃至对我们的污蔑。就像谁的小孩有了错误,家长批评、责备,甚至打骂,都是天经地义的,但别人稍稍说一下,家长也是不乐意,甚至反感、气愤的。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敦煌研究组组长宋家钰研究员说:“日本一位学者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一出,国内一些学者深感有伤我们的自尊。”^①

① 宋家钰《“敦煌学中心说”引起的反思》,载《光明日报》2000年9月21日。

可以说就是这一国民心态的写照。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在中国引起较大的反响后,听说藤枝晃曾有过辩解:原话不是他说的;他只是说: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而翻译没有将此话完全翻译说明,因此造成了误会。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的误会,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影响到了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据有的学者说:日本有些学者也指责藤枝晃,说他此说搞坏了中日学术关系,影响了中日两国敦煌学的交流与合作。1987年9月,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在敦煌召开时,藤枝晃应邀参会,再次来到了敦煌。在来中国参会前,他还从日本专门给金宝祥先生写信,希望去敦煌前,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见面座谈。藤枝晃到兰州后,在西北师范学院专家楼小会议室与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敦煌学研究所的老师如金宝祥教授、陈守忠教授和笔者等七八人座谈约两小时。从会议室出来后,我与藤枝晃先生走在一起,他对我说:“上次在你们这里搞的很不愉快。”藤枝晃先生此话,显然是指1981年5月在西北师范学院的演讲,因为此前他只来过西北师范学院一次。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一经流传,在当时那个极具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从政界到学者,都感到的是气愤、震惊,而没有人去探究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不可否认,它“在客观上无疑对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①。因为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加强敦煌学研究,就成了爱国主义的象征,也是弘扬我民族精神的动力。此后,从官方到学界,都更加重视敦煌学的研究及有关研究组织的建设。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虽然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

① 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74页。